从日本宗教文化看靖国神社问题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 副院长 刘江永

日本的靖国神社祭祀的主要是日本对外战争中的阵亡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日本军部动员侵略战争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当时,日本的神道被升格为凌驾于一切其他宗教之上的所谓国家神道。靖国神社作为“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所特有的宗教设施,其宗旨是将“为国捐躯之人”集体供奉为“靖国之神”和“英灵”,永久祭祀,“万代显彰”。

二战后,随着日本国家政体的变化,军国主义遭到日本人民的唾弃,根据战后日本宪法的规定,实行政教分离。从此,靖国神社不再享有受国家管辖的特殊地位。然而,日本右翼势力一直企图恢复靖国神社在历史上的那种特殊地位。自民党从1969年至1974年先后五次向国会提出“靖国神社法案”,企图通过排除宗教性,把靖国神社作为“特殊法人”来实现“国营化”,但均被否决。于是,他们便企图通过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并使其制度化,以实现既定政治目标。1978年10月17日,东条英机等14名日本甲级战犯,经厚生省批准,被作为“昭和殉难者”载入“灵玺簿”,秘密合祀于靖国神社(*靖国神社内没有亡者的骨灰或牌位。所谓合祀,是把新亡灵的名字载入“灵玺簿”,进行招魂后,使亡灵统一到靖国神社正殿,即完成入灵合祀仪式。合祀仪式通常在每年10月17日—20日秋季大祭的第一天举行。“灵玺簿”平时存放在靖国神社正殿后面的“灵玺簿泰安殿”内。——作者注*)。

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历届日本首相虽然有种种小动作,但是都还不敢以公职身份公开参拜靖国神社。打破这一格局的是中曾根康弘,他在1985年8月15日公开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由此引起日本国内更大争议和邻国强烈反对。

安倍在上台一周年之际即以首相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本月21日是为期三天的靖国神社春季例行大祭首日,安倍虽未进行参拜,但仍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再次向靖国神社供奉了名为“真榊”的祭品,以表达对“为国捐躯将士”的所谓敬意。他的这些举动严重伤害了邻国人民的感情,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一个障碍。

把“文化特殊”做挡箭牌

针对来自中国等亚洲邻国的谴责,日本一些政客和官员总是强调日本文化与习俗的特殊性、日中两国的生死观不同。他们的说辞是:中国人认为如果生前做了坏事,死后应遭唾骂,杭州岳庙前谋害岳飞的奸臣秦桧跪像就是典型;而日本人则认为“人亡不究魂之过”,在日本文化习俗中亡灵是不分善恶的。他们还列举日本人曾为足利时代的逆贼楠木正成等人建立神社,为入侵的元朝军队将士立碑,为日俄战争中战死的俄军将领立碑等等,以作论据。一些人为绕开违反宪法之嫌,宁肯把神道说成是日本的习俗和文化而非宗教。

日本前防卫厅长官瓦力等人宣扬,日本的观念是“死者不鞭尸,不挖墓”。他甚至认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是包含了日本所有文化、传统、习俗的国家应有状态。从广义上讲,可以说是日本文化。日本人承认灵魂的存在,与慰灵和镇魂相伴而生”;“在靖国神社祭祀英灵,是根据日本古来习俗——祖灵信仰、御灵信仰,已成为日本文化”;“为战死将士慰灵表彰是世界各国共同的礼仪”;“作为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理所当然”。

上述说法在日本一些人中仍相当流行,实际上似是而非,根本站不住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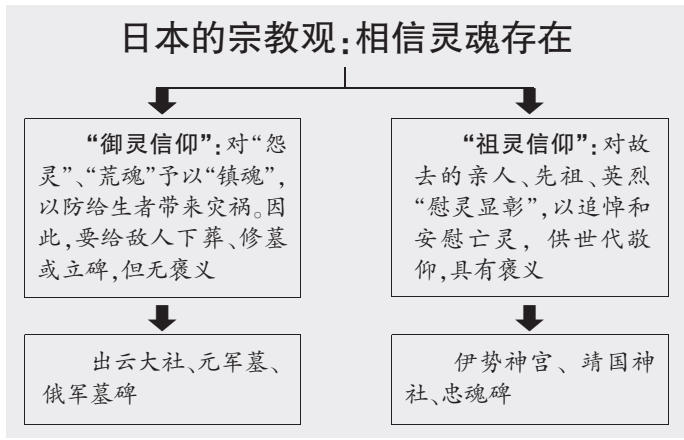
从历史沿革看,靖国神社并不等于日本传统文化与宗教信仰,而只是在明治维新后被军国主义所利用的国家神道的产物,曾构成日本军国主义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日本政府便谎称,神道不是宗教而是日本自古以来的习俗,迫使所有日本人都来尊崇。现在的问题在于,日本有一些人不仅不痛改前非,反而继承了当年的军国主义邪说,用所谓日本文化特殊论来为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辩解。岂不知,这只会适得其反,不仅无助于增进国际理解,反而会加深国际误解,损害日本的国际形象,甚至使人感到日本传统文化就是军国主义文化。而所谓“亡者皆成佛”之说,很容易使人感到日本的宗教文化习俗对生者是没有约束的,无论犯罪还是加害于人都无所谓,反正“人亡不究魂之过”。

亡魂神灵有善恶之分

神道教是唯一产生于日本本土的宗教信仰。到日本的奈良时代(710—784年),神道教发展为皇室和国家一级有组织的宗教。明治维新后,神道教成为国家神道,即日本的国教。二战后,神道教失去了这一地位,成为日本国民可以自由选择的宗教信仰。日本人每逢新年在各地神社参拜已成为传统习俗。

据日本权威工具书《日本宗教事典》解释,在日本神道传统观念中,关于灵魂的概念自古以来大体分为两种,即“和魂”与“荒魂”。前者可带来安宁,后者则会带来灾厄。人们通过祭祀“荒魂”,即“镇魂”,祈祷“荒魂”转化为“和魂”。在“御灵信仰”中,“镇魂”侧重于镇慑“荒魂”,而“慰灵”则源于对“祖灵”的慰藉。所谓“祖灵”,不是指一般意义上家庭祖先之灵,而是包括先祖和先亡者的所有亡灵。在古代,日本民间的“祖灵信仰”认为随着时间推移,先祖之灵将与“祖灵”融合,随时注视呵护着子孙。日本所谓新年的“年神”即是“祖灵”的化身。现代日本社会受佛教影响,葬礼通常更重视追悼家人,“祖灵”的意识相对淡化。

日本关于“神”的概念也分两种,即“善神”与“恶神”。前者是与“和魂”、“祖灵”相通的平安之神,后者则是与“荒魂”、“怨灵”,即因战乱、瘟疫、灾害等丧生者之灵相通的鬼怪幽灵。在日本民间的“御灵信仰”中,给人间带来灾害厄运的“恶神”包括所谓“厄病神”、“贫穷神”等,它们都是作为“荒魂”而存在的,必须通过某种“镇魂”仪式才能驱邪免灾,日本称为“镇送攘灾”。这是因为,在日本神道教的观念中,通过镇祀,“恶神”可以被驱逐出现世,转化为“善神”或“福神”。同样,如果对“祖灵”、“福神”的祭祀有所怠慢,它们就会变为“怨灵”、“恶神”。



■ 日本宗教文化中对亡灵的善恶观念与区分

日本宗教文化对亡灵历来有所区分。日本著名哲学家、日本文化论的权威学者梅原猛明确指出:“靖国神社远远脱离了传统的神道。若将古事记的神道作为传统,可以认为古事记中系由两种神社构成:一是祭祀自己先祖神——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二是祭祀天照大神子孙所消灭的大国主命的出云大社。而且反而是出云大社建造得更大。将为那些因自己夺权而消灭的人们镇魂的神社修建得比自己的祖坟更大,这才是日本的传统。”梅原猛指出:“中国和韩国等日本侵略战争的牺牲者比日本的牺牲者多5倍”,“按传统的日本神道,这些人的灵魂也应祭祀。不对这些人慰灵,而只祭祀本国死者难道不是很奇怪的吗?这是违反传统神道的”。因为根据日本的传统,若不祭祀对方的战殁者,其亡灵就会变为“怨灵”而作祟于现世。

即便是拥护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国学院大学教授大原康男也承认,日本宗教观念和祭祀场所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出自所谓“御灵信仰”的“镇魂”,即日本人相信人亡之后有灵魂,由于担心敌方亡灵作祟带来灾祸,为了转祸为福而设立的“镇魂”祭奠场所。这是出自对战争中失败的敌方、被处死的罪魁祸首等幽灵的强烈畏惧所进行的祭祀,不等于把祭祀的对象作为值得纪念的英烈。第二类是所谓“祭祀英灵”的“慰灵”,即为追悼和表彰“为国捐躯”的将士而设立的祭奠场所。靖国神社便属于这一类。

靖国神社是以恶为善

就主动给敌军阵亡者建墓立碑这一点而言,中日之间的确有所不同,但并不等于日本对亡灵不分善恶。从历史上看,靖国神社本身就是明治政府为了祭祀为明治维新建功立业的“英灵”修建的,靖国神社的正殿只祭祀为日本政府作战而丧生的特定军人和军属等。当时日本内战中属于德川幕府阵营的战死者是被排斥在外的。在西南战争中对抗过明治政府的西乡隆盛,也未被放入靖国神社祭祀。另外,二战期间因临阵脱逃而遭枪决的日本官兵的亡灵,也不能作为靖国神社的“英灵”来供奉。在靖国神社院内,靖国神社正殿的旁边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镇灵社”。“镇灵社”是1965年创建的,其中不分国籍地供奉着正殿中没有供奉的世界各地战争阵亡者的亡灵。它或许体现了日本传统神道中“镇魂”的观念。这说明靖国神社本身就没有对死者一视同仁,而是有严格区别的。日本将东条英机等战犯作为“昭和殉难者”载入“灵玺簿”,供奉在靖国神社的正殿,显然是要把他们作为“为国捐躯”的“英灵”来显彰。这除了体现出日本战前的价值观、战争观和历史观之外,难道还能做其他任何解释吗?

由此可见,上述瓦力先生所谓“人亡不究魂之过”、“死者不鞭尸,不挖墓”的说法只反映了日本文化宗教中对“荒魂”、“恶神”也要祭祀,即“镇魂”的观念,如果要用来说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正当性”,却难免有自欺欺人之嫌。因为靖国神社并未善恶不分,它所祭祀的战犯“魂灵”在日本右翼分子看来是“善”的,而在全世界主持正义的人们眼里则分明是“恶”的。

靖国神社迄今只有130多年的历史,它通过国家神道等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灌输,似乎已使几代日本人的观念脱离了真正意义上日本的传统宗教文化。在笔者迄今接触的日本人当中,包括80多岁的退休教授等文化人,都已不知道神道的观念中还有“善神”与“恶神”之说,当然也不可能正确读出这些日语单词的发音。这说明,正是靖国神社和国家神道阻断了日本传统宗教文化的传承。如今,一些人出于美化侵略历史的政治需要而把靖国神社鼓吹为“传统文化”并继续误导民众,这难道不是对日本传统宗教文化的亵渎吗?看来,日本要解决包括靖国神社在内的历史认知问题,也许需要来一场“文化维新”,对日本传统宗教文化进行再认识,以彻底清除军国主义宗教文化余毒。

靖国神社不是传统文化

综上所述,很明显,靖国神社并不是日本的传统宗教文化,靖国神社只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宗教文化传统的产物,与日本传统的神道没有直接的关系。日本传统神道的宗教信仰是一草一木皆为神,到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把天皇奉为神的“国家神道”取而代之。这种日本近代的“国家神道”来源于统治集团发动对外战争的政治需要。实际上,许多日本人只是在自己家中祭祀先祖,根本不理靖国神社。部分日本人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把在靖国神社祭祀自己的父辈看作一种侮辱,因为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例如,日本和平遗族会的成员就痛恨夺去他们父兄生命的日本军国主义,反对首相参拜并再度把靖国神社作为凝聚日本民族认同的政治工具。

在日本国内各界,围绕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斗争从未止息。《朝日新闻》等媒体对安倍等人参拜靖国神社一直持批评态度。一些日本民众以向法院告状的形式来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理由是首相违反了宪法中的“政教分离”原则。去年,日本知名律师一濑敬一郎发起了对安倍的诉讼,日本国内外364人联名向日本法院提起诉状。诉状明确指出,“安倍的参拜行为,是对世界和平的挑战,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都有权利成为原告”。

日本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党首冈田克也曾多次表示,他不赞成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不是因为来自中、韩等国的外来压力,而是他觉得作为一个日本人不应该去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地方,他不赞成靖国神社的战争观。日本对华友好人士的眼睛更是雪亮的。日本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便明确指出:靖国神社既不是日本历史,也不是日本文化,完全是日本一小部分政治家手中的一张“政治牌”。靖国神社是明治维新以来才有的,它不属于日本国民,不属于日本历史,也不是日本的文化,只是日本一小部分政治家的做秀。靖国神社不仅制造了假神,崇拜战争,造成宗教上的混乱,而且篡改历史,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和武士道精神。神社内供奉的246万多尊所谓“神”,还有战后受到审判的1068个战犯,都是在一系列非正义的战争中为天皇、财阀和法西斯、军国主义卖命而死的人,岂能把他们偶像化、当作神来顶礼膜拜呢?尤其是神社内的“遊就馆”,那是一个全面肯定日本历次侵略战争的展览馆。因此,说靖国神社是战争神社恰如其分。

历史事实证明,对日本来说,靖国神社不仅未能靖国安民,反而祸国殃民。靖国神社与其他神社不同,它具有“可后续性”,即只要是战争中丧生的日本军人便可不断合祀其中。日本经历了战后70年的和平时期,而未来如果自卫队在海外作战身亡也作为“英灵”放入靖国神社,靖国神社是否会再度发挥历史上那种鼓励军人出征的作用,这不能不引起日本爱好和平的人们和亚洲各国人民的警惕。

日本人要摆脱上述精神和感情世界的困境,唯一的出路也许就是像日本“和平遗族会”所做的那样:把靖国神社视为加害于自己先祖和日本国民的精神枷锁而彻底摈弃,认清自己的先祖是受到军国主义驱使才成为战场上的“怨魂”,而不是所谓大日本帝国的“英灵”;只有不忘历史悲剧,才能期待永久和平。